

全球化视野下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

吴秀明, 郭剑敏

(浙江大学 中文系,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为东西文化的交融与互补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东西文化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向发展中的东方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启蒙策略、革命策略与退守策略三种文化现代性的建设方案。它们彼此冲突又相互影响,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发展的复杂的历史状况。文化东亚的客观存在,使得中国及日本、朝鲜和韩国等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在文化全球化以及现代东方文化发展道路上肩负着重要的文化使命,深入研究与探讨中国及东亚现当代文学的现当代性之路也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全球化;现代性;东方文化;东亚现当代文学;文化选择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942X(2004)03-0134-09

一、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历史境遇及其文化策略

全球化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话题,但也应该看到,当前我们围绕全球化所探讨的许多文化命题并非始于当下。可以说,这种在东西文化碰撞背景下如何进行自身文学现代性的思考,一直伴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19世纪末西学思潮进入中国,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化走向衰微之时。这是一次力量甚为悬殊的碰撞,它造成了中国固有文化体系的全面解体。也正是从那时起,中国现当代作家开始采取种种应对策略,着手进行中国新文学和新文化的建设。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准确地说,是东方三大文化圈之一的“东亚文化圈”的中心所在(另外两大文化圈分别是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南亚文化圈”和以阿拉伯文化为中心的“西亚北非文化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东亚各国在文化遭遇上与中国有着大致相仿的经历,深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历史境遇和发展道路,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全球化进程中东方文化的出路以及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选择具有深刻的意义。

历史地来看,中国文化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开始了现代的转型。这种现代转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打破自身的封闭格局,在与西学的碰撞中逐渐获得一种世界意识;二是不断寻求与自身社会变革要求相一致的实践方案。它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文化策略:一是以西学为参照,以启蒙文学为表征,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现代文化建设的启蒙策略;二是寻求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要求相一致的中国现代文化,体现在左翼革命文学中的革命策略;三是站在对现代工业文明怀疑与批判的立场上,以乡土田园文学为载体,旨在回归到传统文明与乡村社会中探寻中国现代文化的退

[收稿日期] 2003-09-14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作者简介] 1. 吴秀明(1952-),男,浙江温岭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2. 郭剑敏(1970-),男,内蒙古武川县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汉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守策略。这三种文化策略在具体的实践中各有得失,它们彼此冲突又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多元文化取向,也形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在审美维度上的不同文化形态。

(一)启蒙文化策略与活跃于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文学相辅相成。它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曾占据主流地位。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启蒙文学的发展势头逐渐低落,直到新时期之初,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坛上大放异彩。启蒙文化策略的启动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现实处境与思想变革要求相一致,也与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危机感与焦灼感密切相连。中国近现代之交内忧外患的现实困境,使得陈独秀、胡适、鲁迅、周作人等一批海外留学归来人士成为现代文坛上启蒙文学运动的倡导者与先行者。而文革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浪潮的涌现,则使刘心武、冯骥才、高晓声、王蒙、张贤亮以及朦胧诗派的北岛、舒婷等作家和诗人成为了新时期文坛上启蒙文学的薪火传人。他们采用“兼收并蓄”、“拿来主义”的文化策略,从西学中盗得天火,以期为中国文化注入新的、富有生命活力的血液。在文学的主题上则极力推崇以人道主义为本的“人的文学”。启蒙运动者虽然以开放的姿态引进西方文化,但在具体的吸收与转化上却是有所选择的。两次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都是“人的解放”,前者致力于对封建思想文化体系的批判,猛烈抨击吃人的封建礼教,针砭国民性痼疾,从而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后者则侧重于揭露与批判极左政治对人的价值尊严的践踏以及极左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人的异化。正是具有这样的文化启蒙意识,所以中国的启蒙运动者多从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中去寻求有效的思想资源,他们十分青睐欧洲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而对20世纪以来表现工业文明中人的虚妄荒诞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排拒,这是由中国具体的启蒙使命与思想解放要求所决定的。

现代性的一大特征便是理性精神的觉醒,西方现代性的发生与现代历史的开端,正是以文艺复兴运动中将人从神的禁锢下解放出来的理性解放运动为标志的,而中国的启蒙运动虽然在时间上与西方有着较大的落差,但在精神实质上却是甚为一致的,它同样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中国文化现代性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与探求。启蒙文化策略曾内化为中国现当代史上的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破除专制僵化思想的束缚、推动人的解放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中国的两次文学启蒙与启蒙文学作为文学主潮先后各持续了十年左右,第一次从1917年到1927年,第二次从1978年到1989年。前者受阻于后起的激进的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现代文化建设策略由启蒙转向了革命;后者则是在20世纪90年代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以及价值观转变的情况下才逐渐淡出的。但从现代中国文学、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启蒙文化策略依然有其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启蒙文化策略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传统批判有余而继承不足,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东方文化的精义未能进行全面的梳理与开掘,在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中,侧重于对西学的学习与引进,没有及时地将自身文化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进行有效输出,而“一种新文化的稳固性有赖于它把自己否定的文化中的一切富有营养的乳汁统统吸食到自己的身体里来”〔1〕p.75,这样才能使自身的文学、文化祛弊趋利,走向良性的发展。

(二)与启蒙文化不同的是另一种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的最大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革命;二是对资本主义的全方位批判,所以在这里将其称为革命文化策略。革命文化策略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密切相关。它酝酿于五四时期,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大张旗鼓地宣扬,随着30年代初期“左联”的成立及其活动的开展而蓬勃发展,通过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得到进一步明确和规范,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策略成为了可以允许的惟一合法的存在。反映在具体的文学观念上,则表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取法苏联的文学实践,坚决奉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创作方法和艺术原则,在文学主题及题材上,倡导阶级斗争意识,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来写人叙事。按照这一文化策略进行创作的作家有蒋光赤、胡也频、茅盾、沙汀、艾芜、叶紫、殷夫、赵树理、

梁斌、柳青、杜鹏程、浩然等理论批评方面的则有周扬、胡风、钱杏屯、成仿吾、瞿秋白、冯雪峰、林默涵、邵荃麟等。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革命文化策略的主要表现是对传统的不断否定与对未来的大胆畅想。1928年,太阳社与创造社一方面倡导革命文学,另一方面展开了对鲁迅、茅盾等作家的批判;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则确立了工农兵文学的新方向,从而与五四文学传统拉开了距离;1949年以后,左翼革命文学的地位又进一步得到了巩固和发展。这种不断革命的倾向在文革十年中达到了顶峰,激进的文化革命派所提出的所谓“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最为光辉灿烂的新文艺”的口号,就是这种文化主张的极端体现。革命文化策略的另一表现是站在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立场批判资本主义。在这一点上,它与启蒙文化策略有着根本的不同。启蒙文化策略以西学为参照而进行自身的文化建设,它对西方文化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而革命文化策略则将西方文化视为反动腐朽的对象严加批判和鞭笞。也正因如此,这一时期中国现代文化的现代性走上了一条与西方截然不同的道路,用当代学者汪晖的话来说,就是反西方现代性的现代性道路。

革命文化策略的选择与现代中国的革命要求以及所走的道路密不可分。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由启蒙转向革命,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求建设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愿望相一致。而建国以后这种文化策略的日益强化,则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世界两大社会阵营的意识形态对抗有关。西方对刚刚建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敌视是当时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在国家民族积弱的情况下,用革命文化策略来寻求文学、文化现代性的发展道路,有其深刻的时代必然性。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革命文化策略在具体的审美实践中存在着教条化、庸俗化的倾向。强烈的政治功利性往往造成了文学本体独立审美品性的丧失,加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不断否定以及与西方文化的相对隔绝,致使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及理论建设相形见绌。革命文化策略在武装革命时期的确曾起到了团结民众和打击敌人的作用,为创建现代独立的民族国家做出了贡献,但当革命文化策略所体现出的这种战时功利主义所依赖的历史合法性已不存在时,这种策略就更多地呈现出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色彩。同时因其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还使它身不由己地走向某种僵化和自我封闭,从而对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性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体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最后一种现代文化建设方案,我们称其为退守文化策略。这种文化策略的价值取向体现为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怀疑和否定,主张回归传统文明与道德,追求宁静和谐的田园乡村生活。从文化进化论的角度来看,这种主张回归传统的文化立场有着退守的特点;但从现代性的观点来看,它又有着审美超越性的特点。我们知道,现代性与现代化相辅相成,现代性表现为对理性的认同和肯定,但文学的现代性除了受制于社会现实的世俗层面外,它还可以而且应该具有超越现实的审美层面。在这一层面,它侧重于关注现代化过程中人性的异化,反抗理性的统治,捍卫人的精神自由,对现代化形成一种批判和超越。从这一点上来说,退守文化策略并不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是社会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在审美层面上形成的对现代化本身进行批判和超越的文化立场。与启蒙文化策略和革命文化策略相比,可将它看作是一种积极防御型的文化现代性的建设策略。退守文化策略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思潮中一直没有占据主流位置,相反,由于它的超越现实的审美文化立场,常常受到较为功利的主流文学的批判和排斥。

退守文化策略虽没有形成如启蒙文化策略和革命文化策略那样声势浩大的思想潮流,但它在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长河中一直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具体表现在文学主题上,是扬传统精神道德和自然人性,抑世俗生活和阶级斗争;在艺术上,追求一种写意、抒情和诗化的美学风格。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家有废名、沈从文以及京派的其他作家,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则有汪曾祺、张炜、张承志、贾平凹、铁凝、迟子建、海子等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家有意淡化和远离主流意识形态,在对自然人性和古朴田园的抒写中,保持文学独立的审美品格。在现代文学史上,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桃园》、《桥》,沈从文的《边城》、《萧萧》、《柏子》、《月下小景》等,共同构造了远离都市文明

的诗意化的乡村世界,从而反衬出工业文明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破坏,以及虚伪堕落的都市文明对人的自然天性的扭曲和毒害。沈从文小说《虎雏》中描写的那个由乡下来到城市的纯朴憨厚的青年农民,并没有如人所愿成为一个所谓的有教养的城市青年,相反却很快因杀人而逃回了农村,作家由此鲜明地表达了自己对都市现代文明的批判立场。沈从文的这种文化立场在新时期作家中可找到不少。铁凝在新时期初期发表了一篇取名为《哦,香雪》的短篇小说,该作表现的是随着火车进入大山深处的台儿沟,火车给这里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不少的冲击。在这里,火车是现代大工业文明和相应的现代都市新生活的象征,而以香雪为代表的台儿沟的乡村少女则是古朴的农业文明的化身。作家藉此一方面表现出了新时期乡村青年对外面的现代新生活的向往和期盼,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现代文明浸染下纯朴自然的乡村生活必然会遭到破坏的怅惘之情。至于张炜的《九月寓言》、《柏慧》,张承志的《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贾平凹的《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海子的《麦地》等作,在这方面更显示出了可贵的文学追求和精神立场。于是,文学的本体独立性也因此得到有效的彰显。当前,随着大众文学的崛起和精英文学的边缘化,以及现代生活的越来越国际化、都市化、工业化,这种退守文化策略的写作已日益明显地呈现出固有的美学价值和协调生态平衡的意义。当然,也应该指出,退守文化策略虽在一定程度上重视对民族本土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开掘,但它对工业文明和都市化生活不加分辨、一味批判的文化立场,也值得反思。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退守文化策略有必要对狭隘民族主义保持一定的警惕。

总之,中国现当代作家基于自身的理解、认识和实践,从他们从事创作的那天起,就以最具个性化和想像力的独特方式,从不同方向和维度致力于文学现代性的探寻。这种现代性的探寻,不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得到了审美的体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步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思想界出现的自由派、新左派和新儒学等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彼此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就与前述的三种文化策略具有某种渊源关系。在当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现代性建设依然任重而道远。采取怎样的应对策略参与全球化的文化共建以彰显汉语写作的魅力,这是中国作家无法推卸的一个神圣使命,也是我们人文工作者需要认真思考的一个严肃话题。在构成东方文化的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与阿拉伯文化三大文化中,只有中国文化没有宗教色彩,它没有文化的禁忌与排他性。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的是精神修养和道德秩序,这对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精神危机也许是一个很好的补充。但东方文化的振兴,首先必须恢复自身的生命活力,能在解决当前人类所面临的严峻冲突与文化困境中体现出自我的价值,只有这样,才能使东方文化有效地释放它的潜能,并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否则,其悠久的传统文化恐怕只能被当作博物馆中的古董供人观赏,那是可悲的。

二、全球化进程中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作为合力的可能与必要

东方文化的重要一脉在东亚。东亚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与经济的概念。从历史上看,东亚各国都曾不同程度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已深深地注入到自身的文化血脉之中。“由华夏文明的播散而出现的东亚文化圈,实际上是一个有层次、分先后的时空结构:中国本土文明是其主干,朝鲜、越南文化为其两翼,日本文化在其边缘,而东南亚华人社会则成为它伸向外部的触须。〔2〕(p.10)共同的文化基础,使东亚各国在当前即使有着再多的文化差异,也能够找到对话与共建东方文化的桥梁。“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都存在着文化的东亚。文化的东亚,即文化东亚,是以中国文化为基础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内在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共识,有着相当强的文化内聚力的文化和合体。〔3〕(p.2)文化东亚的客观存在,为东亚作为一种合力来重振东方文化和参与东西方文化的对话,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东亚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有着大致相仿的经历,而且彼此互为参照,互相影响。19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全面入侵东亚,东亚各国都遭遇到了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他们经历或正在经历的现代化道路尽管差异很大,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也甚为悬殊,但在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变革的方式以及道路的选择等方面,却有着惊人的相近之处。东亚各国在近现代西方列强的侵略下开始觉醒,寻求自己的富国强兵之路,出现了中国的“中体西用”、日本的“和魂洋才”以及朝鲜的“东道西器”等甚为相似的变革模式。当然,其中日本率先取得了成功,而中国和朝鲜则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获得长足发展,但这也促使东亚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了日本,以日本为学习的对象,借日本来输入西方的学理与文化。这一点最典型地体现在中日的现当代文学交流之中。

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与西学东渐有着极大的关系,西方文化在近现代伴随着军事与经济势力的渗透而涌入中国,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产生,一方面来自自身变革的主观愿望与努力;另一方面来自对外来文化中可资借鉴的文学营养的吸收。以往我们在研究这一现象时,主要关注的是西方文化在进入中国本土后所产生的结果,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传播的途径与渠道。西学东渐中的一个“渐”字,可以说非常形象地抓住了这一特点。西方文化在进入中国本土时有很大一部分不是直接拿来,而是借助了一个踏板,这个踏板便是日本。同样是西方的精神文化思想,经过转化之后的引入与原汁原味地横移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其中其实也包含了文化交流的某些深层规律与特点。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承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异族入侵与掠夺,国人也正是在这种屈辱的经历中开始走向觉醒。但在近现代的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中,在中国人思想上引起强烈震动的恐怕不是中英、中法之战亦或八国联军的入侵,而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p.9这次战败所引起的有识之士的震撼,直接引发了中国的戊戌变法。日本自明治维新之后国力日渐强盛,它的成功对已在思变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启发。如康有为所言:“闻日本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3〕p.10中国在晚清时期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其中尤以日本为盛。据近代史学家李喜统计,中国留日学生在1896年有13人,1898年为61人,1901年为274人,1902年为608人,1903年为1300人,1904年为2400人,1905年为8000人,1906年为12000人,1907年为10000人〔4〕p.83。留日学生之多,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中国人留学日本主要是两个目的,一是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二是通过日本学习西方文化。

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的影响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与思想背景下进行的,这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与倡导者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等都有留学日本的经验,他们在日本取得他山之石,并综合从西方“拿来”的主义,进行文学革命与文化启蒙。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直接受日本文学影响的作家是很多的。鲁迅于1924年不仅翻译出版了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而且还专门开设课程进行讲授;其同时期创作的散文诗集《野草》也深受《苦闷的象征》的影响。创造社更是由留日学生在日本组织成立的一个文学社团,其文艺思想及创作方法与日本当时盛行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文学思潮以及私小说创作观念具有直接的渊源关系。中国早期的话剧也大多假道日本而引入,日本不仅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国外的优秀剧作,而且也是中国早期戏剧工作者从事戏剧活动的一个重要舞台,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便是由李叔同、欧阳予倩等留日学生发起成立的。另外,五四时期小诗派的出现也与日本的和歌、俳句有着密切的关系。日本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但表现在现代文学的发端期,同时也贯穿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各个历史阶段。中国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日本的左翼文学紧密相连。“在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史上,20年代末至30年代是日本左翼文学理论和左翼文学作品翻译的全盛朝代。在此时期翻译过来的日本文学作品和文学理论著作中,左翼文学占了大部分,在中国作家和读者中广为流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4〕p.100正如胡秋原所描述的

那样:中国近年汹涌澎湃的革命文学潮流,那源流并不是从北方俄罗斯来的,而是从同文的日本来的。在中国突然勃兴的革命文艺,那模特儿完全是日本,所以实际说来,可以看作日本无产文学的一个支流。[4] p.100 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新感觉派与日本的新感觉派更是一脉相承。只是后来由于战争的爆发以及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文学环境的自我封闭,这种影响才减弱了下来。当然就总体而言,在这一时期,不仅是日本文学,我们基本上关闭了除苏联文学外的对外文学交流的大门。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文学在中国的引进虽不是十分引人注目,但川端康成、井上靖、大江健三郎、村上春树、渡边淳一等作家的作品,先后在中国掀起了不小的热潮,而且有的在时下的阅读界还在发生着持续的影响。即使今天,日本文学对我国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总之,日本文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日本文学创作实践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也有经日本引进的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中国文学之所以在自身的现代性进程中如此热衷于向日本学习,一方面是由于日本地处中国近邻,有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另一方面更主要则在于中日有着共同的传统文化基础,日本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积极吸收外来文化所取得的成功,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最直接的例证,实践也证明了这种学习引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

东亚文学的交流不仅限于中日之间,中国与朝鲜及韩国之间的交流也甚为密切。在东亚各国中,中朝之间的文化交流最为悠久。中国与朝鲜在地理上接壤,交通便利。据史料记载,汉字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战国时代就已传入朝鲜,儒学随后也开始得到传播,公元372年(高句丽第17代小兽林王二年)还专门建立儒学教育机构——太学,所开设的课程与中国无异,使得朝鲜成为受中国儒教文化浸染最浓的东亚国家。从上古到近世,朝鲜历代文学都深深打上了中国文学的烙印;汉诗在朝鲜半岛风靡一千三百余年而不衰,造就了不可胜数的朝鲜汉文学家,其中“四大诗人”声名尤其显赫,新罗的崔致远被誉为“东方文学之祖”,高丽的李奎报被誉为“朝鲜李太白”,高丽的李齐贤被誉为朝鲜的“汉诗宗”,朝鲜的申纬被尊为朝鲜的“诗佛”,相当于中国的王维[5] p.6。正如韩国学者金台俊在谈及汉文在朝鲜文学史中的地位与作用时所说:“自从汉文输入我国以来,我们的先祖一直用汉文编写历史,进行科举,吟诗歌,撰制文章。汉文固然有其弊端,但觉得不是有害无益。我们不能忘记,正是汉文筑就了我们的历史文化。无论你是把汉文学看作是中国文学在朝鲜的发展,还是将之视为朝鲜文学的一部分,但任何人也绝对无法把这个宽阔博大的领域排除在朝鲜文学范畴之外。”[6] p.290)

在文化现代化以及近现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方面,中朝之间更是有着甚为密切的联系。这其中最值得提到的便是朝鲜的“三一”运动对中国的五四运动的影响。“三一”运动是朝鲜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它的爆发成为继之而起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先声。朝鲜自1910年起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在这之后,朝鲜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19年3月1日,汉城的学生、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等各阶层约三十万人聚集在塔城公园,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示威,这一行动很快便传遍全国,引发了全国性的示威和暴动。“三一”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朝鲜的爱国独立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同时,这场运动在反帝救亡的行动方式上也极大地启迪了中国人民。也正是带着这样的启示和警醒意识,一场爱国反帝的五四运动在中国爆发了。有学者指出,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意义在于:“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反映了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朝野居主导地位的反威尔逊巴黎和会外交方针力量同日本的冲突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一样,朝鲜‘三一’运动则集中代表了世界殖民地被迫民族解放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强有力推动。”[7] p.115 朝鲜“三一”反日爱国运动失败后,一批朝鲜革命者逃亡到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继续开展反日复国的斗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朝鲜义勇军、朝鲜革命军与中国的抗日力量一同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反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的斗争。这种唇亡齿寒、同舟共济的命运处境与斗争历程,为中朝的现代文化交流与共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日本统治之下的朝鲜也出现了要求建设本国新文化的呼声。1920年6月创刊的《开辟》杂志,推动了朝鲜本土的新文化运动。该刊第5—8号连续译载青木正儿的长文《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介绍中国的新文学革命运动,后来胡适还应邀为该刊1921年新年号题词^①。此后,朝鲜学界一直对中国新文化运动及新文学发展走向予以密切关注,1949年,朝鲜国内出版了由尹永春编写的一本小册子《现代中国文学史》,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出版了许世旭、金时俊、李充阳等学者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论著。

共同的文化承传,近现代以来甚为密切的文化交流传统,为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在未来的东方文化的现代性共建提供了可能。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不期而然地触及反思民族的主题,都在积极地探索表达现代人思想感情、生存体验的有效形式。无论是中国的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老舍,还是日本的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夏目漱石,他们既是所在国的伟大作家或诗人,同时也是各自国家现代文化的积极发起人或推动者。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都曾为各国文化现代性做出自己出色的贡献,而作为已经渗透到东亚各国传统文学中的东方文化,也必然会随着这种现代性的共建与发展而熠熠生辉。

当前,东亚各国的经济迅速发展。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东亚经济在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获得高速发展;中国内地随着改革开放的有效推进,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也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美国学者霍夫亨兹在其《东亚之锋》一书中写道:“如果我们不了解东亚何以会具有对于我们的优势,以及我们如何利用这种优势来建立我们自己的优势,那么我们的尽管是最果断的努力也会只落得如同在沙上建塔的后果。我们潜在的对手来自一个与我们如此不同的世界,它们的历史之根如此深邃、如此古老,以至于忽视它们今天取得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实在是太愚蠢了。”[8] p.19)东亚经济建设的成功为东亚共同推动东方文化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经济保障。同时,文化东亚的客观存在,也为东亚各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合力来弘扬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参与东西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可能。在全球化视野下,东亚各国文学有必要强化自身的东方文化意识。应该看到,东方现代性的发生虽落后于西方,但这并不等于东方文化在整体上要落后于西方文化。西方现代性发生和发展的先行性,只能说明它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领先性,并不足以说明其全部文化的完美性。而文学作为一种诗性文化,就更不能以处在社会演进的先后来对它进行价值定位。当代拉美文学的崛起与成功便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当然,东亚及其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亚洲’其实并不仅仅是所谓‘儒家文化圈’或者历史的联系,那些历史的联系经过百余年不同的‘现代化’的进程而逐渐淡薄”[9] p.99),尤其是在以电视媒介为主导的大众消费成为重要文化力量的转型时代,东亚文化也面临新的挑战。也正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和道理,有人通过对当下电视文化中流行的“日剧”和“韩流”(如木村拓哉、常盘贵子主演的《美丽人生》,安在旭、崔真实主演的《星梦奇缘》等)的分析,提出了一个“新的亚洲性”的概念。这个“新的亚洲”在面对全球化的时候,面对了许多共同的问题,也有共同的期望和渴求,这些共同性都是在面对西方的时候产生的”[9] p.99)。这种“新的亚洲性”虽然具有相当的实用主义的色彩,但它的广为流行,也说明中国年轻观众的需求和亚洲其他地方的类似群体的共同性。一方面大家都在对西方生活方式充满期望,另一方面又需要一种温和的和传统的方式来“中和”西方的冲击力”[9] p.100)。东亚是全球的东亚,也是东亚的东亚。到底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涉及到东西、古今文化碰撞与融合等一系列问题。就东亚文化内部构成来看,它还有个与自身文化传统及现实国情接轨的问题。只要真正深入东方文化的复杂和多面性之中进行研究,在讲东方性的同时注意

^① 参见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体现与时俱进的、全人类的普遍要求。或者说,在进行富有东亚文化个性和民族特色的作品创作时,注意融入全球意识与全人类思维。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东方文化随着东亚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以及彼此国家民族之间的交流,一定会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个新的开拓,在全世界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徐葆耕.西方文学 心灵的历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
- [2] 陈伯海.东亚文化与文化东亚[A].上海社会科学院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东亚文化论谭[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15.
- [3] 陆玉林.东亚的转生[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4] (转引自)王锦厚.五四新文学与外国文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
- [5] 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 [6] (转引自)王向远.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 [7] 张德旺,谢治东.朝鲜三一运动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4): 112-115.
- [8] [美]小R·霍夫亨兹, K·E·柯德尔.东亚之镜[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
- [9] 张颐武.论“新世纪文化”的电视文化表征[J].文艺研究,2003(3)92-101.

Cultural Selection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East Asia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U Xiu-ming, GUO Jian-m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Globalization, which emerged in the 1990s, provides both a new perspective i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Eastern culture and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a new way of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First of all, Chinese literature was brought into line with globalization the same time as it became modern. Therefore, research into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lso means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modernization. Historically speaking, the three cultural strategies to develop modern culture - enlightening, revolution and retreat - were worked out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influenced and conflicted with each other in practice, forming pluralistic cultural orientations 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various cultural patterns in literary aesthetics. Now Chinese literature still has a long way to go modern in the present-day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What strategies to adopt to jointly build global culture calls for serious consideration. Secondly, globalization features culture shock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acclimation in various area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East Asia as a cultural entirety. In terms of the formation of Eastern culture, three cultural circles have come into being: the East Asia cultural circles with Chinese culture as the center, the South Asia cultural circles with Indian culture as the center, and the West Asia-North Africa cultural circles with the Arabic culture as the center. The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a and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historical role in the cultural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astern culture.

The literatur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share the s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the fine tradition of close communication in modern and present-day times, which provides a good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these countries. Furthermore, their rapid economic growth has guaranteed the said development. Eastern culture will eventually give a new lust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modernity; Eastern culture; modern literature in East Asia; cultural selection

国际科技合作伙伴选择原则

随着国际科技合作与提升大学科技实力、促进学科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大学认识到科技竞争力是维护一所大学的根本利益及提高学术声誉和地位的基本保证。因此,加强多种形式的国际科技合作,联合国际优势力量,借助国际智力和财力资源提升大学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增强科技实力,正成为当代大学的战略选择。

开展国际科技合作重要的一环,就是选择合作伙伴,这是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因此,如何寻找合适的合作伙伴,把握好选择原则,是希望涉及合作研究的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尽管目前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借鉴,但浙江大学通过近年来的国际科技合作实践,在合作伙伴选择原则的把握上已有了一些经验和体会。一般而言,合作伙伴的含义有二,一是合作的伙伴国,二是具体的合作者,两者的选择原则是有所不同的。

1. 合作伙伴国的选择。根据国家的科技特色开展合作是选择合作伙伴国的原则之一。与发达国家开展科技合作,可以加速提高我们的科研水平,增强我们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促进学科的发展,提升综合科技实力,因此,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已成为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国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目前,我国大部分合作伙伴国是西欧、北美及亚洲的日本等科技强国,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在强调与科技强国合作的同时,也不能忽略甚至放弃与欠发达或不发达国家的合作。这里包含着两层意思:其一,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优势,特别是那些仅比发达国家稍弱的国家,尽管它们的总体科技水平不及科技强国,但往往在某些研究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准,甚至可能超过发达国家而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若与这些国家的优势领域合作,同样可以达到促进科技进步的目的,且更容易与之沟通和合作。其二,即便是不发达国家,与其合作也可能带有许多比合作本身更深层次的含义。如通过合作,可让世界加深对我们的了解,展示自己极具魅力的一面,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等等。因此,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作伙伴国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战略举措,浙江大学与葡萄牙的国家科技合作就是根据不同国家的科技特色选择合作伙伴的较好例子。

虽然近代的葡萄牙在欧盟各国中还属于经济欠发达的国家,但它在生物技术、新材料和电子信息等高新技术领域已具有一定的研发能力。它们中的多数实验室设备精良,有的在欧洲堪称一绝,个别的还可与世界实验室媲美。我们选择这些领域进行合作,成效不但不亚于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合作,而且因为葡方合作者态度积极,富有诚意,为双方的沟通和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比如,中葡合作成果“血液接触材料及其工业生产”在“尤里卡”计划规模最大的科技交流会“尤里卡(会合)亚洲”会议上进行了展示,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和好评。该项目已在海外重要刊物及世界生物材料排名第一的杂志上发表了多篇论文,在2000年的“第六届世界生物材料会议”上所作的口头报告,已被大会委员会授予“杰出博士后研究旅行奖”。目前双方正在谋求申请欧洲专利。基于其工业应用背景,中葡两国的大学、研究所和企业正在寻求共同申请欧洲尤里卡计划项目的可能性。《浙江日报》、《浙江大学报》、科技部网页及科技部编撰的《中国国际科技合作巡礼——回顾与展望》一书分别对此作了报导。

2. 合作者的选择。国际科技合作取得成效的另一重要因素就是要选择好具体的合作伙伴。选择的原则应该注意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合作者要对合作持积极的态度,怀有极大的诚意,对合作的课题要有共同的研究兴趣,并保证投入相应的时间、精力和资金。同时,还要有具体的执行措施和研究计划,以保证项目得以高质量地完成。这是合作的充要条件,也是合作能否顺利进行和可持续发展的前题和基础。其次,要充分考虑双方的条件,特别是要挖掘各自的科技潜力和优势互补的可能。比如,我们在与欧洲国家合作时,就是考虑到对方拥有高新技术领域的先进实验条件,有许多高水平实验室向国外开放,而我们则具备人才的优势,包括有思维活跃、动手能力强的中青年学者,有大量优秀的研究生可参与研究工作。这样,各方在合作中只要正确把握好各自所扮演的角色,明确自己追求的利惠和希望达到的目标,就能真正体现优势互补的效应,以较小的投入取得较大的回报。最后,科研工作者要尽可能多地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特别是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因为这是结识同行的最好机会。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才有可能今后在学术上有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这比经网络或其他形式寻找合作伙伴更容易和更可靠。

(张菊)